

東方叢刊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

• 1994 •

第 2 辑

办 •

东方丛刊

季羨林題

1994年第2辑

中 华 美 学 学 会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 04 号

东方丛刊
1994 年第 2 辑
梁潮 主编

责任编辑:王 昶

封面设计:阳 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计测中心激光照排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43 字数: 211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7-5633-1825-9/I·082

定价: 7.50 元

《东方丛刊》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委员

伍蠡甫 季羨林 金克木 林焕平 苏关鑫

特约编委

马 奇	韦旭昇	王向峰	王世德	乐黛云
朱维之	刘纲纪	刘安武	严绍溟	张鸿年
张朝柯	陆梅林	杨 烈	李 芒	周来祥
饶芃子	俞灏东	贾植芳	陶德臻	敏 泽
黄海澄	梁立基	蒋孔阳	程 麻	彭端智

常务编委

王炜炘	王 昶	刘绩元	张葆全	张明非
沈家庄	贺祥麟	胡光舟	党玉敏	雷 锐

授本刊宏文力作重奖 为文坛专家学者润笔

关于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的协议

经过订立协议单位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等四方共同协商，为弘扬东方文化传统，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东方美学、东方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学术园地，将《东方丛刊》办成中国研究东方诗学（亚洲非洲诗学）的高品位的专门性的学术丛刊，决定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特订如下协议，以利评奖工作开展。

一、奖项名称 长期以来中国的东方诗学（亚洲非洲诗学）的研究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缺少这样一个专门性的理论阵地，为把《东方丛刊》办成一个研究东方诗学的优秀的专业丛刊，特将本奖项命名为“东方丛刊诗学奖”。

二、主办单位 本奖项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上述三大学会主要负责学术上的推荐、评选工作，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编辑部主要负责评奖的组织和事务工作。

三、评委组成 本奖项的评委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等四方的代表组成，其中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各为六名，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为四名，广西师范大学为一名，总共十七名。本奖项评委由广西师范大学与各学会根据工作需要共同协商确定。本奖项评委不搞终身制。各位评委应该广泛听取该学会会员

对评奖工作的意见，各位会员对评奖工作的意见应该及时反映给所属学会和《东方丛刊》编辑部。

四、评奖标准 所有发表在《东方丛刊》上的论文都可以参加评奖。不评分别在《东方丛刊》和其它报刊上重复发表的论文（欢迎各位评委和读者发现这类论文时及时写信通报《东方丛刊》编辑部），先发表在《东方丛刊》而日后又收入该作者本人的专著书籍中的论文可以参评。评选论文时只考虑该论文的学术质量，不考虑该论文作者总体上的学术成就。强调各个评委必须遵守客观、科学、合理的原则，以身作则维护本奖项的严肃性、公正性、学术性。强调各位评委在推荐人选时要注意让中老年作者（45岁以上）和青年作者（45岁以下）各占相当比例。

五、评选方法 评选的第一步先由十七名评委各将自己所推荐的论文篇名（限定每位评委只能推荐五篇）挂号寄往《东方丛刊》编辑部；第二步由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编辑部聘请公证机关进行监票，然后再将全部被推荐的论文各获得的推荐票数反馈给各位评委；第三步让评委在上述基础上以挂号邮寄的方式正式投票评选（仍然限定每位评委只能推选五篇论文）；第四步由公证机关对评选结果进行公证，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五篇论文为获奖论文，获奖的五篇论文按各获得票数的多少为序排列名次，分为一、二、三等奖。如果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五名出现多篇论文得票并列的情况则由评委协商解决。

六、评奖时段 本奖项每两年为一届，即评《东方丛刊》两年内所出版的八辑（若出合辑，则为七辑）上所发表的论文。

七、评奖名额 每届总共评选奖励五篇论文，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两篇，三等奖两篇。

八、奖金标准 一等奖获奖论文每篇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二等奖每篇一万元，三等奖每篇五千元。全部奖金由《东方丛

刊》编辑部负责提供。

本协议已经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审查同意，各方都必须承担本协议中各自的义务，以利评奖工作的进行。

中 华 美 学 学 会：_____（盖章）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_____（盖章）

全 国 高 校 东 方 文 学 研 究 会：_____（盖章）

广 西 师 范 大 学：_____（盖章）

1994年10月10日

常务主委：林焕平

苏关鑫

主 编：梁 潮

副 主 编：王 杰

麦永雄

目 录

	关于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的协议
	东 方 文 化
陶东风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及其文化语境/P. 1
王一川	转型再生辩证法：中国小说美学的一次新的书写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新人”典型/P. 29
丁淑文	从“他者性”走向“双性同体” ——女性美的迷误及探索与回归/P. 53
王小舒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新文化/P. 65
王汶成	
申洁玲	《诗经》阐释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型/P. 79
	中 外 东 西 比 较
张道葵	空白与接受 ——中西审美经验比较/P. 95
田惠刚	语文差异：东西方文化背景中特殊的美感因素 /P. 110

编辑人员：冯仲平
莫其逊
陈源泉

岳介先 侯传文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中国艺术美学/P. 124 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对抗 ——关于东方学的思考/P. 137
东方美学	
张荣翼	“气”的美学 ——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蕴含/P. 148
姚文放	中国戏剧美学的整体思维/P. 171
东方文学	
刘洪一 陈春香	摩西律法与犹太艺术的传统精神/P. 185 川端康成的无奈 ——《睡美人》之我见/P. 198
詹福瑞 黄伟林	从哲学之气到“文气”/P. 206 周颖南与孔子学说/P. 219
东方文库	
朱良志 王丽丽	谈《中国美学精神》的研究方法/P. 230 凝精立极，成中国气派 ——评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P. 241
边国恩	中国研究、教授东方美学、东方文艺理论、东方文学、比较文学人员名录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理事会名单] (九) /P. 248
韦笑	东方书目 (九) /P. 253 本丛刊发行的广泛范围

——收藏本丛刊的图书馆与图书资料室名录
稿约

广西师范大学 中 文 系 编辑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及其文化语境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陶东风

清末民初小说的流行与普及，是一个空前的文学现象，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社会文化现象。小说著、译的出版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以及知识界对其评价之高，都表明小说已取代诗歌而入主文类谱系的中心。我们不妨从当时人的言论中摘录几段相关的文字：

嗟乎！昔之以读小说为废时失势、误人心术者；今则书肆之中，小说之畅销，百于群书。昔之墨客文人，范围于经传，拘守夫绳尺；而今之所谓小说家者，如天马行空，隐然于文坛上独翘一帜。观阅者之所趋，而知著作者之所萃。盛矣哉小说乎！①

今试一游乎通都大邑之书肆，则所陈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说矣。又试入穷乡僻壤，则除小说外，他项书籍，殆不可得见焉。与夫野老妇人孺子谈，彼其除小说以外无所知，无足怪也。即学士大夫号为通知古今者，其起于小说，亦复津

津乐道。②

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焉而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故今小说之势力，视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此事实之无能为讳者也。③

以上言论或许不无夸张，但足以表明小说之盛行确为当时遍及于知识界与平民界的重要审美文化现象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如社会变革的要求、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发展、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西方文化的冲击、市民阶层的兴起，等等。与此同时，小说批评、小说理论也勃然兴起，不但当时有许多专门的小说刊物（如《小说月报》、《小说林》）刊载小说评介，而且其他有影响的报刊（如《新民丛报》、《觉民》），也大量发表此类文章，数量很多，其他文学类型的研究文章难以望其项背。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以清末至民初约20年间的小说批评及理论文章为主要材料，结合社会文化大语境，检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意向及文化态度。

一、小说地位：中心化与附庸化的悖论

众所周知，中国是诗的国度，向以诗为宗，散文次之，小说则不登大雅之堂，被认为是“刍蕘狂夫”之议，“道听途说”之所造，其价值与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诗文相比，尊卑之别自然难以道里计。我想，古人心目中载道之“文”恐怕是不包括小说的。

小说地位的彻底变化发生在清末民初，小说的地位在当时一下子从文学谱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用当时的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即“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自梁启超率先喊出这一口号后，应者不绝。但是，小说地位变化的动因并非来自文学内部，而是社会变

革的需要把小说推上了文学金字塔的顶端。也就是说，小说地位的中心化是因为它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工具（比之诗等）。可见，时人推崇小说就象古人推崇诗一样，都出自非文学的尺度。因此可以说，从文学的尺度看，小说地位的无限上升是基于人们对小说艺术的误解，对小说社会作用的无限夸大。人们在把小说当成改造国民、拯救民族的万能良药的同时，又粗暴地将它打入了附属的地位。请看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的宣言《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先新小说，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欲新风俗必先新小说，欲新学艺必先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先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总之，欲新一切都必须先新小说；反过来说，新了小说，别的一切必都随之而新。革新小说成了革新一切的前提，而革新小说之外的一切又是革新小说的目的和动力。这样，梁启超完全是站在革新社会的功利立场提倡小说革命的。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一个人在那里故作惊人语，而是不少人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小说不仅是救国良方，而且简直就是唯一良方。天谬生（王无生）声称：“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⑤。一种文学类型获得如此殊荣是令人吃惊的。陶祐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影响》中把小说说成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的“一大怪物”，是“20世纪的中心点”，他认为，“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遍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⑥最后两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表明小说被当成了民族复仇的手段，纳入了当时救亡的主旋律，成

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在声明了小说的重要性以后，他紧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

吾今敢上一巩固完全之策，以贡献于我特别同胞之前曰：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之幕乎？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同胞请注意！昌明暗线，诱掖国民，慎勿弃髦视之，尘羹弃之，鄙琐忽之。……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语都出自一种极为情绪化与独断论的口气：非此不可、唯此而可、必须……才能……。要把握这种话语特征，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即：礼崩乐坏、民智愚钝、政治腐败、列强瓜分、民族危亡。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代，一切客观的学术探讨与理性的分析态度都是不可能的，高度膨胀的民族复仇心理、迫不及待的救亡要求使一切文化活动，当然包括文学活动，都带上了强烈的、急功近利的实用色彩。这是一个喊口号的时代，人们不断地、迅速地推出了各色救国良方，而小说救国就是其中的一种。仿佛小说是普渡中华民族的挪亚方舟，小说革新了，国民就能开智，国力就能强盛，风俗就能纯正，甚至实业也能发展。其实，当时是一个盛产救国论的年代，除小说救国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救国论。它们大都是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未经慎重思考、只凭感情冲动即时提出、又即时放弃的口号。正因如此，小说救国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点，还不如说是一种民族情绪。

二、小说救国论背后的两种思维模式

小说救国论是与小说亡国论同时出台的。误认为中国的落后或是由于对小说的轻视，或是由于古典小说全是海淫海盗的玩意儿，才可以逻辑地推导出革新小说即可救国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出台是以对西方的误解为预设条件的。也就

是说，对于中国小说功能的误解是基于一个先在的对西方小说功能的误解。小说救国论者无不认为：西方（包括日本）的强盛全赖对于小说的重视以及他们的小说与中国小说不同的特点。所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救国论者很喜欢把“泰西”各国小说的作用（当然是被夸张了的）当成自己最主要的依据，仿佛找到了铁一般的事实。梁启超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仕人志士，往往以其身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出一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治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⑧该文写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可见，梁启超如此推崇小说，实在因为他早有一个先入之见：西方的强大原因就在小说。此种言论今天看来当然相当幼稚，但却说明了一种后来十分流行的中西比较模式的形成：为西方所有者，必为中国所无，而且必是西方强大、中国落后的原因。也就是说，凡能富国强民者，必为西方所有，中国所无。这种比较模式与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挑战、中国回应”模式非常相似，因为后者同样在西方与中国之间作了二元划分，认为在中国传统中缺少近代化这种赶上西方的资本。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文章《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日本）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预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反观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⑨此外，“老棣”在《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说得更干脆：“吾国小说发达最迟，故民智开通亦最后。”^⑩

对小说作用的夸大的背后还有一个思维定势，即重精神轻物

质，认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亦即林毓生教授所概括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它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文化改革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①林教授虽然把这种基本设定看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但它实际上在清末民初已十分流行。其具体表征是：当时知识分子把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当成整个社会革命的根本前提。深藏在这种观念背后的更基本的哲学预设，是把世界当成是精神力量的显现。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夸大小说的作用，其根源正是这种以心理为世界本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他们的逻辑运演程序是：世界（包括社会）的本体为精神，故精神的革命可以改造世界；又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影响精神的力量，故小说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根本。让我们看看这一程序在管达如的《说小说》中是如何展开的。首先是小说与心理的关系，“夫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应也。因有小说，而此等社会心理，益绵延于社会。然则社会也，小说也，殆又一而二，二而一者矣”，为什么说小说与社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呢？因为小说与社会的本体都是心理：“小说之所以能有若是之魔力者，何也？曰：……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天下惟本为其心理所造成之物，则其契合也，愈易亦愈深矣。”^②可见，小说与社会的互为因果论只是小说决定社会论的曲折表达，从思想深处说，思维决定存在、道德决定制度、小说决定社会是当时更为流行的观点。

三、“启蒙”与语言革命

值得追问的是，即使肯定了思想文化革命的优先性，为什么近代知识分子偏偏看中了小说，而不是哲学、历史或宗教？也不是文学领域中的别的文类，如诗歌或散文？也就是说，为什么小说比别的人文知识类型与文艺类型更能营造人心、支配世道？结果表明，小说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的工具性，而小说之所以是最有

效的工具，是因为它特殊的审美和艺术特征。

小说影响人心的力量首先就在于它的通俗性。通俗作为小说的特征，是相对于正统诗文及文言小说而言的。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小说以白话为宗，文言小说只是小说的前身。而且，人们推崇小说，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它通俗。但是，人们选择通俗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因为个人爱好，而是为了救亡和启蒙。而在救亡与启蒙二者中，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概而言之，启蒙是文化革命（批判旧文化建构新文化），而救亡则是社会革命（民族的自强、自立）；启蒙是个体本位的，而救亡是民族本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除鲁迅等极少数外）都把民族自强自立放在首位，并不认为个体的觉醒具有本体意义和终极价值。出于强烈的精英意识，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启蒙的对象是数量大得惊人的、文化水平又低得可怜的百姓，自己（少数精英）是不需要启蒙的。正因为这样，启蒙话语必须越通俗越好。通俗小说就是因此而身价倍增的。因为小说的通俗性决定了它的读者范围广，尤其是普通百姓爱读，而他们又正好是启蒙的对象。中国的大众多是些文盲或半文盲，高深精致的韵文或文言文是欣赏不了的。因此，白话小说“于中国社会势力最大”，甚至于“中国社会而受小说之祸也，此种小说（指白话小说）实尸其功；中国社会而蒙小说之祸也，此种小说实尸其咎。”^⑬

对于小说之通俗特征的认识早在明代的冯梦龙就已有了，他在《喻世明言》的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虽少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能之乎？”但是，冯梦龙缺乏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意识，因而他不可能把通俗与启蒙相联系。近代知识分子就不同了。康有为指出：小说因为“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⑭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